

## 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

鍾延麟\*\*

周恩來與彭真皆是中共黨史上重要的領導人。關於兩人之間政治關係的演變問題，迄今缺乏專門的學術研究。周恩來與彭真在中共建政以前互動不多，甚至在延安整風中有一些不愉快的經驗。然而，從中共建政至「文革」爆發以前，雙方關係發展大體平順，不受先前不快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毛澤東下令中央書記處管控國務院的工作後，周恩來、彭真之間的政治關係出現了微妙的發展：周恩來一方面仍以黨內上級的身分領導彭真；另一方面，周擔任政府總理的工作，又要受制於中央書記處的指揮(彭真是書記處的第二號人物)。在周恩來、彭真兩人具體的互動過程中，周恩來不以資深先進自居，對彭真不但沒有等閒視之，有時還會表現出一種欣賞和謙讓的姿態。這主要肇因於：彭真獲得中央層峰的重用和在上層領導的活躍(固定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和主持書記處的常務工作)；彭真表現出來的政治堅定和「政

---

\* 本文初稿發表於：「第四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天津：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南開大學，2013年10月21-24日。作者特別感謝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李海文研究員、南開大學的徐行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的關向光教授、澳大利亞Monash大學的孫萬國(Warren Sun)教授，以及其他不便具名的中國大陸研究人員，曾對本文的惠予指導與評論。另外，作者也感謝兩位審查人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001-MY2)。

\*\*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聯絡地址：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No.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治正確」(在經濟調整時期中，其主張與毛澤東多有雷同和合拍)；彭真工作認真，以助手之姿盡力配合周恩來處理黨國日常事務，為後者分憂解勞。在「文革」前夕，雙方已有良好的互動與信任。周恩來甚至曾提議由彭真接任其政協主席一職。然而，看似不錯的周彭關係，在毛澤東決定批判、清洗彭真後，即驟然中止。周恩來在毛明確表態後，也加入了批鬥彭真的行列。在「文革」期間，周恩來雖力能所及地減緩彭真在人身安全上所受的磨難，但在後者應否復出政壇、恢復工作的問題上，則表現得不甚積極。本文有助觀察中共早期的政治運作情形(特別是在所謂的中央「一線」內)和複雜的高層人事關係。

**關鍵詞：**周恩來、彭真、毛澤東、中共高層政治、中共黨史

## 一、前言

周恩來在中共歷史發展中佔有突出的地位並長期發揮重要的政治影響。周恩來從 1920 年代起即參與中共中央領導，直到 1976 年去世為止。他在中共建政後又擔任政府總理、統管國務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故有「政治不倒翁」和「共和國大管家」之稱。彭真在中共政治中也甚為活躍。「文革」前彭真同時跨足中央政治(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地方政治(北京市黨委第一書記、市長)。其當時的政治能量和經管工作範圍，較諸他在「文革」後重新復出工作的職權，實際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文革」前中共黨的權力中樞「中南海」或是國家的首善之區北京市，周恩來與彭真之間都有大量的往來和密集的互動。然而，在汗牛充棟的周恩來研究和新興發熱的彭真研究中，迄今卻仍未有一個系統探討、深入探究周恩來和彭真之間的政治關係的學術研究。本文欲嘗試填充此一重要的研究空白。考察相關議題的重要性在於：一方面，可以檢視周彭關係在不同階段的演變起伏，及其背後的促發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此一個案觀察和凸顯周、彭各自的政治傾向與個人特質，並對他們所處的政治環境和機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周恩來與彭真在中共建政以前就有所互動，但是兩人政治關係的發展，主要發生在中共建政後至彭真伴隨「文革」爆發下台的這段時期。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較諸彭真資深和崇高，但是 1958 年毛澤東調整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關係後，出現了一個略為尷尬的局面：周恩來主管的政府工作，必須受到彭真擔任副職的中央書記處的管控。周恩來由於認識到毛澤東對彭真的器重，毛、彭在 1962 年經濟調整政策上的立場一致，以及彭工作能力強、認真而負責的特質，所以周對彭真正視以待，也適時加以提攜。周彭兩人在「文革」前數年的政治配合和協作，事實上，構成了當時所謂中央「一線」領導的重要部分，對維持黨國日常工作的穩定運轉有重要的作用。毛在「文革」前夕失去對彭真的信任並決定將之打倒後，周恩來也隨之轉變對彭真的態度。「文革」期間，周恩來雖

然對彭真的人身問題偶伸援手，但對後者的政治問題則沒有積極的表示，反映出相關人事和權力關係的複雜。

本文的目的在於：試圖勾勒出周恩來與彭真之間在中共歷史上的往來梗要與相處情形，冀以對中共早期的高級領導人的人際往來、高層政治運作，以及相關歷史人物的認識有所裨益。在討論的時間斷限上，將以 1928 年周恩來代表中央介入處理彭真深涉在內的順直省委問題開始，因為這是周恩來和彭真之間第一次重要的政治互動。討論直至 1976 年周恩來病逝為止。文內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概有七個部份：一、周、彭早期的政治關係；二、在「大躍進」開始前後，隨著中央書記處銜命管控國務院以後，周恩來如何應對政治聲勢、影響上升的彭真；三、周、彭在工作上如何配合，以及兩人在「文革」前關係的發展情況；四、彭真從「文革」前的大紅大紫到被打入政治另冊的概要原因；五、在彭真因文藝批判問題逐漸引毛不悅、甚而令之大怒的過程中，周恩來有何態度和作為；六、「文革」期間周恩來在朝任事、彭真階下為囚的情況下，前者對後者的人身待遇和政治問題作何表示。最後，在結論的部份，簡要探討影響周彭關係的原因，以及本文討論如何增進對中共早期政治的了解。

## 二、周恩來與彭真早期的政治互動情形

### (一) 中共建政以前

周恩來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資歷，遠高於彭真。周恩來甚早即在黨中央擔任領導要職，彭真則從華北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中逐漸起家。周恩來與彭真在中共建政以前的互動關係和往來經驗並不多，其中甚至還存在一些政治上的不愉快：一是在「順直糾紛」，另一是在延安整風。

1928 年底，周恩來曾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長的上級身分，出面處理彭真涉入其中的順直省委問題。該問題發生的背景是：1927 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後，順直地區的革命運動出現了陷於內訌、紀律鬆散和停滯不前的狀態。其造成的主要原因包括：順直省委先後領導人之間的個人

意氣之爭，特別是彭述之和蔡和森之間的纏鬥；在如何發展當地組織和開展活動上的策略分歧，如蔡和森與劉少奇、陳潭秋的各有所重和區別；地方情結所導致的對立猜忌，譬如河北籍黨員就對彭真為首的山西籍黨員抱有惡感；以及中共中央自身在情勢快速變化下對革命方向的搖擺不定。<sup>1</sup>彭真在順直省委領導人頻繁更替的過程中，有時是處於被批評的地位。例如：1927年秋，省委主事者為了迎接、配合革命高潮的到來，主張當地黨人要發起工人和農民暴動響應。彭真被指派到有不少工人聚集的唐山，負責組織起義活動。然而，彭真在了解基層情況以後，覺得條件未臻成熟而最後決定按兵不動。他因此被指責是「右傾」。但是對於彭真的組織才幹和工作表現，省委的幾任主持人在更多的時候是褒多於貶。<sup>2</sup>

由於順直省委內部的爭論持續不斷，黨中央屢次派人處理未果，最後決定由周恩來出馬調查和仲裁。周恩來在停留、指導工作期間，雖然對於彭真的工作能力表示肯定和欣賞，但由於彭真沒有按照上級指示在唐山策動暴動，有違組織紀律。另外，周恩來也批評彭真有個人主義傾向和具有農民意識的問題。<sup>3</sup>周恩來提出的處置方案是將彭真調離順直省委的領導職務，先是另行分配工作，後又決定送赴蘇聯學習。只是後來因故沒有實行。<sup>4</sup>對於周恩來所作的相關政治結論和組織決定，彭真或有些不以為然。<sup>5</sup>次年，彭真被同黨的變節者出賣而被捕入獄，直到1935年才走出牢房。彭真出獄後，繼續從事地下活動；在對日抗戰開始後，他到晉察冀根據地領導黨的工作。

周恩來和彭真之後出現比較直接的互動，要到了1940年代前半期的延

<sup>1</sup>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83-106。

<sup>2</sup>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56-61。

<sup>3</sup> 關於周恩來在1928年底批評彭真一事，在「文革」的批判材料中也有反映：「1928年，彭真在順直省委擔任組織部長，年底，周恩來同志主持召開的順直省委擴大會議上批判了彭真等人的錯誤，並罷了彭真省委組織部長的官。」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機關摧舊兵團，《彭真罪行錄：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目罪行錄1》（北京：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機關摧舊兵團，1967），頁126。

<sup>4</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1卷，頁57。

<sup>5</sup> 「文革」的批判材料指出：「彭真對此非常仇視。」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機關摧舊兵團，《彭真罪行錄：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目罪行錄1》，頁126。

安整風運動。毛澤東在中共高層發動整風的目的之一，是要批判黨內錯誤的政治路線、傾向和相關人士，從而統一思想並樹立自己的核心領導地位。整風的兩個批判標靶是：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宗派和以周恩來為首的「經驗主義」宗派。毛在發動相關批判時，甚為借重彭真。<sup>6</sup>彭真在晉察冀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他在1941年到延安宣講該地的工作成果，被毛澤東讚譽為「是馬列主義的。」彭真被毛留在中央黨校工作，負責訓練高、中級幹部，並積極參與領導1942年開始的整風運動。<sup>7</sup>在中央高層的整風上，彭真也狀若先鋒，他毫不客氣地批判周恩來，表現得「態度很不好。」<sup>8</sup>彭真在整風中表現出來的真理在握、自居正確的姿態，周恩來看在眼裡，頗不是滋味。但是周恩來自覺有錯在身，所以對彭真的相關言行隱忍下來，沒有在兩人之後共事時流露出來。<sup>9</sup>但周恩來牢記在心、從沒忘記。他對彭真在延安整風中作為的不滿，在後者已失勢的「文革」時期大為宣洩。<sup>10</sup>

彭真在延安期間因得毛澤東的欣賞而政治行情看漲，進而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躋身中央領導層、成為政治局的一員。同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因為毛澤東、周恩來前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的關係，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書記處補選了彭真和陳雲為書記處候補書記。由於中共當時

<sup>6</sup> 延安整風期間，彭真和周恩來分處優勢和劣勢的地位的問題，陳毅在「文革」中就表示：「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挨整嗎？」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201。

<sup>7</sup>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頁119-137。

<sup>8</sup>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第51期（香港，2013.04），頁138。

<sup>9</sup> 原來是中共官方治史機構中負責研究周恩來歷史的高文謙，對此表示：「平心而論，從個人關係上來說，周恩來對彭真的為人並無太多好感，其中緣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期間。當年彭真追隨毛澤東、劉少奇整肅黨內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唯我獨革、不能容人的霸氣，讓他很不以為然。不過，當時周氏自覺理虧，並沒有過多計較，長期以來，還是一直把彭作為黨內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來看待。」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06。

<sup>10</sup> 例如：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彭真在延安整風中「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彭說他既非教條主義，又非經驗主義，驕傲自滿、自高自大，從無自我批評。」〈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規劃搶佔東北地區，彭真也被任命出掌東北黨政大權，可見其當時在黨內的炙手可熱。彭真在領導中共中央東北局期間，遭到當地黨內同僚，包括：林彪、陳雲和高崗等人的嚴重批評與挑戰，終而引起中央的介入。在東北局領導改組後不久，彭真黯然離開「白山黑水」，回到中共中央工作。<sup>11</sup>

## (二) 中共建政至1957年

在中共建政後，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要如何安排因東北問題在黨內結怨不少、在中共與國民政府搶天下的過程中立功不多的彭真呢？出掌首都北京市，可讓具有城市工作經驗的彭真適得其所、發揮所長；在政治上也算得上是給彭真一個「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職位安排。在1954年以前，彭真雖繼續參與中央領導工作，但其主要的工作重心在北京市，也就是以地方領導人為主的工作身分。在此一時期，彭真對於黨政職務都在其上的周恩來甚是尊重；在首都治理工作上，也因受周在內的中央領導人的直接關注而不敢懈怠。<sup>12</sup>

1954年，「高(崗)饒(漱石)問題」被揭發和處理後，打從東北以來即對彭真甚為敵視的高崗，<sup>13</sup>從一貫政治正確被批貶成一路壞事作絕。在批判高崗問題上，周恩來和彭真皆甚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在其中不約而同地為對方說話，強調高崗過去在政治上是如何地不善待對方、甚至是赤裸裸地加以反對。例如：周恩來指控高崗：「他最恨的就是陳雲和彭真，臨死還要血口噴人」、「高崗到東北後不是幫助彭真，而是看著彭真垮台。」<sup>14</sup>彭真則以牽拉繩子以偷走牛為比喻，強調高崗反對周恩來和劉少奇，乃是為了

<sup>11</sup>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sup>12</sup> 在中共建政的前夕，彭真即曾對天津市負責人黃敬表示：「在北平有毛主席、周副主席，有黨中央管著我們，我們每天都在謹慎從事，不敢懈怠。」郝建國，〈彭真餐廳講「大事」〉，《百年潮》，2011年第4期(北京，2011.04)，頁28。

<sup>13</sup> 高崗後來即自承：「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有成見的，如對彭真等人，理都不理，有報復心。」趙家樑、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53。

<sup>14</sup> 趙家樑、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17、218。

要反對毛澤東、竊取最高領導權。<sup>15</sup>周恩來和彭真或是想藉由批判高崗的機會，傳達對彼此的善意，以利將來雙方的互動。

高崗政治垮台、甚而自殺後，彭真的政治壓力大為減輕，他在中央高層發展和活動時所負載的無形政治枷鎖，也順勢被打開了。<sup>16</sup>在此背景下，彭真在中共中央領導層中，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角色。1956年中共舉行「八大」。此會將原有的中央書記處改作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其與政治局並置為中央的最高決策機關。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上四人為副主席)、鄧小平(總書記)被選入中央常委會。彭真雖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但由於主要受到了與他在東北時期存有嚴重工作紛爭的政治人物的反對，尤其是林彪，因而錯失了進入常委會的機會。<sup>17</sup>但是中共「八大」另立中央書記處，代表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管理中央日常工作。彭真擔任排名第二位的書記處書記，協助鄧小平「負總責。」<sup>18</sup>彭真據此也成為中共中央分作「一線」、「二線」時，在「一線」內的一名重要成員。<sup>19</sup>

<sup>15</sup> 〈蔣南翔同志傳達四中全會報告〉，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001，目錄號022，案卷號00089，頁15。

<sup>16</sup> 1954年4月，北京市委召開市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主要內容即是批判高崗問題)。劉仁在會上表示：「彭真在東北沒有什麼錯誤，是高崗給搞的」、「彭真這幾年心情不舒暢，不敢放手工作，就是因為有高崗在旁邊」、「現在問題解決了，彭真的負擔解除了，也就好了。」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戰鬥兵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二號頭目劉仁罪惡史(1927-1966)》(北京：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戰鬥兵團，1967)，頁10。

<sup>17</sup> 關於彭真在中共建國以前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但是建國以後卻何以沒有成為其中(改制為政治局常委會)的正式成員的問題，彭真在晚年對此提問一開始說：「這事我說不清，我水平不夠。」但他後來就同一問題表示：「自我從東北回來，林彪到了中央，我知道我就要倒臺了！」由此可見，彭真認為林彪正是其未能位列最高決策機構的關鍵因素。李海文、王燕玲，〈晚年的彭真——訪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原主任李尚志〉，收入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頁312-313。

<sup>18</sup> 《彭真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真傳略》，頁219。

<sup>19</sup> 從1950年代中期至「文革」前，毛澤東將中共中央領導人分作「一線」、「二線」。毛藉此可以退居「二線」以擺脫日常工作，而要其他領導人在「一線」直接領導黨國工作。在「一線」者，主要是毛和朱德以外的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以及中央書記處人員。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彭真在書記處內地位僅次於鄧小平，所以在「一線」內算是位居前段。在1958年中央書記處擴權後，彭在「一線」內就更為重要和活躍了。

彭真在中央書記處內另外負責分管政法和統戰工作。由於周恩來主管黨的統戰工作，周恩來、彭真兩人在相關工作領域上，特別是對「黨外上層活動分子」和對知識分子問題，有很多的互動。1956年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調查和相關會議的召開，<sup>20</sup>以及1957年中共邀請黨外參加「開門整風」和之後在人大、政協兩會的「反右派」中，都可見兩人同時出面、一起工作的情況。<sup>21</sup>

### 三、周恩來重視政治地位上揚的彭真

從1957年底到1958年春，毛澤東一再地批判1956年由周恩來、陳雲主導的經濟「反冒進」政策，同時為主張「多、快、好、省」的「大躍進」鳴鑼開道。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周恩來連番檢討，甚至自行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sup>22</sup>周恩來雖然獲得慰留，但是毛澤東主導的權力和組織調整，將周領導的國務院置諸在由鄧小平、彭真領銜的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之下。1958年2月17日，正是由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因為書記處不熟悉國務院的工作，一下子無法全盤掌握，彭真還建議周恩來和陳雲兩人之中，必須有一人留在北京。<sup>23</sup>

周恩來雖在中共「八大」後擔任黨的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會中的排名也在鄧小平之前，但對於「八大」另設的中央書記處，周恩來一開始就表達了尊重其職權、不介入運作的態度。<sup>24</sup>他對於1958年擴大權力、凌駕

<sup>20</sup> 李海文、王燕玲，〈團結黨外人士重視知識分子——訪彭真秘書、北京市委黨校教授馬甸〉，收入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264-269。

<sup>21</sup> 〈周恩來同志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負責人座談會的談話紀錄〉，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216，目錄號1，案卷號116，頁35。

<sup>2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1396。

<sup>23</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3卷，頁288。

<sup>24</sup> 根據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雪峰回憶：「書記處成立後第一次召開會議時，周恩來同志參加了，小平同志請他主持會議，周恩來同志一再說他不宜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會議，結果由小平同志主持，以後都是如此。」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

在國務院之上的中央書記處及其領導人，就更為重視了。周恩來甚為看重鄧小平，在對下級指導工作時，他有時會援引鄧總書記的指示和意見，作為政策的預期目標和執行方向。<sup>25</sup>對於中央書記處的「二把手」彭真，周恩來也沒有等閒視之，有時還會表現出一種贊賞的態度，甚至是謙讓的姿態。其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彭真在中央領導層中享有的突出地位和重要影響，直接反映出毛澤東對之的欣賞。

中共「八大」以後，彭真雖僅是政治局委員而不具中央常委身分，但經常出席常委會議，直接參與黨國機要。事實上，彭真的政治作用和影響，較諸若干常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享有崇高威望的朱德，不太涉入具體的領導事務。陳雲因為經濟主張和政策與毛澤東存在歧異，「大躍進」開始後即受到冷落，雖在該運動後的經濟調整期間，曾短暫地重享經濟決策大權，但從 1962 年夏以後又靠邊站，甚至根本不被通知出席常委會，僅是一名虛有其名的常委；相形之下，沒有常委身分的彭真反倒一直是與會的固定成員。<sup>26</sup>1958 年補選為黨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林彪，因身體之故，出席頻率也不高，另外他主要管轄軍隊工作，工作涵蓋面也不及彭真來得寬廣。出席常委會議長年不斷的周恩來，對於彭真「不是常委的常委」的地位，自是清楚明白。

在負責處理黨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處內，彭真在組織上被指定是鄧小平的副手。在鄧小平有事時，毛澤東通常即指定由彭真代理主持書記處工作。<sup>27</sup>鄧小平抓大放小的政治性格，也讓彭真有很大的發揮餘地；鄧小平重視規律生活、休憩娛樂（後來或含有政治閃躲的用意），也讓彭常有獨當一面的機會。<sup>28</sup>周恩來在 1966 年曾就此表示：「彭（真）實際上是第二書記。鄧

---

出版社，1998）上冊，頁221。

<sup>25</sup> 鍾延麟，〈中共建政後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49-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臺北，2009.11)，頁169-220。

<sup>26</sup>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下冊，頁941。

<sup>27</sup> 例如：1959年6月初，鄧小平因跌倒導致腿部骨折。毛澤東指示：在鄧養傷期間，由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3卷，頁410。

<sup>28</sup> 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42-43。

小平對他很放手。」<sup>29</sup>從 1958 年以後，因為國務院要按書記處的「具體部署」進行「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周恩來經常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與鄧小平、彭真討論工作、進行協調。彭真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時，周恩來就算事忙本人無法前來，也會派人(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到會旁聽，並在會後聽取其匯報。<sup>30</sup>周恩來雖貴為黨的副主席與政治局常委，在同彭真討論工作時，還客氣地作出請示匯報的姿態，對此，彭真曾多次不無感觸地對自己下屬提起。<sup>31</sup>

對政治權力天秤傾斜方向極為敏感的周恩來，當然清楚彭真之所以能成為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固定班底」、受命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的關鍵原因——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對彭真的欣賞和重用，特別是毛對彭的分外器重。彭真的重要下屬王漢斌即表示：「我覺得毛主席對彭真在東北的問題看得不是很嚴重，『文化大革命』前一直很重視他，找他單獨談話的次數比周恩來還多。」<sup>32</sup>周恩來因而對彭真不敢小覷。

第二，彭真表現得政治忠誠和「政治正確」(與毛澤東一致)，也是讓周恩來對之刮目相看的重要原因。

彭真對毛澤東的指示，一向不變調地忠心執行。周恩來對此知之甚詳。事實上，他也與彭真多次合作，戮力貫徹領袖的政治意志。例如：1959 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不滿彭德懷對「大躍進」政策缺點的批評，認為是對其個人領導威信和政治路線的直接挑戰，決定對之展開「反右傾」鬥爭。毛將會議相關工作交予周恩來和後來被召喚上山的彭真。<sup>33</sup>周、彭兩人齊力履行此一政治任務，包括：傳達和執行毛澤東所要求的對彭德懷要新帳、

<sup>29</sup>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sup>30</sup> 根據童小鹏的回憶：「彭真是中央書記處書記，有時開會，總理派許明去旁聽。許明回來要向總理匯報。」童小鹏，《在周恩來身邊的四十年》(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下冊，頁658。

<sup>31</sup>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06。

<sup>32</sup>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0期(北京，2012.10)，頁73。

<sup>33</sup>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和毛澤東1963年後的關係〉，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 (2011/05/01點閱)。

老帳一起算的批鬥方針，<sup>34</sup>以及共同起草制定旨在批判彭德懷錯誤的會議決議。<sup>35</sup>廬山會議結束後，周恩來負責完成 1959 年最後一季的經濟計劃，彭真則負責執行「反右傾」運動。此外，周恩來、彭真和鄧小平一起制定了符合毛澤東要「繼續大躍進」的心意的 1960 年經濟計劃。<sup>36</sup>

「大躍進」難以為繼後，在如何收拾該運動造成的經濟危局上，發生了在中央「一線」內周恩來等人和彭真看法殊異、反倒唯有彭真和居於「二線」的毛澤東意見相仿的情況。在 1960 年代初期的經濟調整時期，為了盡快解決經濟衰敝不振的危機，在「一線」的中央領導人莫不絞盡腦汁地想方設法。「大躍進」期間一度離開經濟決策圈的陳雲，在 1962 年春提出了一系列的刺激經濟方案，例如：出售高價商品以讓鈔票回籠，開放自由市場以活絡物資流動並增進創收。陳雲更主張包產到戶、甚至分田以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對於陳雲所開的經濟「藥方」，也悉數認同、響應。<sup>37</sup>然而，彭真卻表示不同的意見。他禁止北京市開放自由市場；<sup>38</sup>直指販售高價物品卻無提高糧食收購價格會不利工農關係；<sup>39</sup>更明確表態反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sup>40</sup>

1962 年炎夏，毛澤東對此前諸多經濟鬆綁政策和倡議發出不滿，認為是資本主義復辟、修正主義抬頭。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不得不放棄原先主張。毛澤東對於多數政治局常委沒有站穩立場、站對路線，甚為憤怒並懷記在心，後來更將之明指為「1962 年的右傾」錯誤。<sup>41</sup>相形之下，排在七人常委之後的彭真，其旗幟鮮明的立場反而與毛澤東多有吻合。彭真自此直至「文革」前夕，獲得毛的政治青睞並常受命擔綱演出，

<sup>34</sup> 童小鹏，《在周恩來身邊的四十年》下冊，頁 552。

<sup>3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卷，頁 246。

<sup>36</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49-450、452-454。

<sup>37</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 488。

<sup>38</sup>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和毛澤東 1963 年後的關係〉。

<sup>39</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4 卷，頁 194。

<sup>40</sup>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 391。

<sup>41</sup>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sup>42</sup>

周恩來在政治上越到後來越以毛澤東的意向為指路的明燈，甚至曾用負責掌舵引船的「梢公」，形容毛作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領航者的地位。<sup>43</sup>彭真在1962年上半年在中央「一線」內敢於獨排眾議，甚至曾在具體問題上如對經濟困難形勢的估計，向周恩來提出異議。<sup>44</sup>彭真堅持己見，事後證明與毛「梢公」不謀而合，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有政治「高明」、獨到之處。這或也是周恩來在1960年代中葉左右與彭真互動時，不以黨內先進自恃，而多將後者看作是黨內奉行毛的「正確」路線的人物的主要因素。

#### 四、周恩來與彭真在工作上的配合

彭真除了深受層峰重用、政治上堅定而敏銳，他工作能力強，幹練又勤奮，與周恩來配合得宜，對後者確實起到分憂解勞的作用。

在方方面面都管的中央書記處內，鄧小平與彭真工作上的契合，毛澤東就曾以「你們兩個是一小一大」為喻。<sup>45</sup>彭真在書記處內實際挑起事前準備議程、事後落實決定的重擔角色。<sup>46</sup>書記處候補書記楊尚昆據說曾表示：彭真「很能幹，是未來的總書記。」<sup>47</sup>常向中央書記處請示、並多有公事往來的地方領導人，對於彭真在中央的重要地位，也了然於胸。根據「文革」小報的揭發，從治理廣東到進而主管中南地區的陶鑄曾說：「彭的地位實際

<sup>42</sup>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頁152。

<sup>43</sup>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10。

<sup>44</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北京，2002）第7冊，頁147。

<sup>45</sup> 李向前撰稿、王桂華編導，〈彭真〉，《百年潮》，2002年第11期（北京，2002.11），頁79。

<sup>46</sup> 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綜合組副組長的陳麒章後來就回憶：「小平同志不在家的時候，都是他（彭真）主持書記處會議。在我印象中，中央有幾個人是最忙的。書記處討論的問題，都要先經過他（彭真）那裡過一道。小平同志開會組織定了以後呢，具體落實也交給彭真同志去安排。」李向前撰稿、王桂華編導，〈彭真〉，頁78。

<sup>47</sup> 〈千刀萬剮心不甘——憤怒揭發楊尚昆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籌備處主辦，《戰報》（北京），第5期，1967年2月15日，4版。

上是副總書記。鄧小平的耳朵有點聾，打電話聽不清，有事情問中央，打電話給彭真。」<sup>48</sup>作為國務「大管家」的周恩來，與在中央書記處內又處於前沿的彭真工作往來頻仍。周恩來一方面注意到彭真對自己所抱持的尊敬態度；另一方面，他也認識到彭真的工作能力和勤奮精神。

首先，彭真是黨內的後起之秀，有時言行衝動，不免鋒芒畢露。<sup>49</sup>但是他對周恩來還是保持一定的尊重和禮數。如前所述，「大躍進」開始後，彭真的權位因中央書記處的擴權而水漲船高。即便如此，彭真和周恩來在共同領導某一特定工作時，仍會特別注意周的意見，強調以之意見為定奪。例如：中共中央為慶祝十周年國慶並展現「大躍進」的威力和成就，決定以一年左右的時間在首都北京市建造完成十項工程——也就是包括擴建天安門廣場、興建人民大會堂在內的「十大建築」。彭真由於同時兼任北京市的負責人，受命規劃、指揮相關的工程。但是他多次強調：「周總理是十大工程的總設計師，劉仁、鄭天翔、萬里同志和我都是做具體工作的，對規劃設計和施工中的重大關鍵問題，我們一定要即時向周總理請示匯報。」<sup>50</sup>在下級針對相關工程問題提出請示報告時，彭真閱後多僅劃圈而不作具體批示，留給周恩來做最後的裁決。<sup>51</sup>另外，周恩來交代彭真過問、處理的事情，無論是事關中央全局、北京市或是地方的問題。彭真都慎重以對、確切辦理。<sup>52</sup>

其次，周恩來對工作的投入與付出，享譽中共黨內、為人稱道。彭真

<sup>48</sup> 〈反革命兩面派陶鑄罪惡史〉，東方紅農業大學革命委員會政治部主辦，《東方紅戰報》（江蘇），第86號，1967年9月15日，8版。

<sup>49</sup> 1966年6月5日，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林楓在校委會上就表示：「彭真要出問題，我早有預感」、「彭真這幾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像個刺蝟。」首都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關於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材料》（北京：首都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1966）第4集，頁7。

<sup>50</sup> 馬句，〈彭真和北京城市建設〉，收入李海文主編，《彭真市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202。

<sup>51</sup> 〈吳晗為藝術處理問題給總理、彭真、萬里同志的函〉，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002，目錄號011，案卷號00140，頁1。

<sup>52</sup>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1963年2月，周恩來提出：「城市的五反，要請彭真抓一抓。」彭真之後即很認真地主持相關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535。

工作認真、不分晝夜的精神和長時辦公的耐力，在「文革」前的中共高層中也是頗為出名。值得指出的是，彭真乃有意識地以助手的身分，相應配合周恩來的工作時段和安排自我的作息時間。這也可看作是彭真以黨內晚輩的身分，對日理萬機、操勞公務的周恩來的一種敬意表達。

周恩來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毛澤東也慣於在夜間活動。鑒此，彭真刻意順著他們的工作習慣在中央執勤和當班。與彭真有長期工作關係的王漢斌回憶：

與小平同志相比，彭真不會休息，生活也沒有規律。新中國成立以後，彭真一直隨著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工作習慣，經常工作到凌晨兩三點鐘甚至通宵工作。<sup>53</sup>

根據彭真秘書們的回憶，周恩來與彭真除了彼此間傳閱審批中央文件以處理黨國日常事務，兩人幾近每天凌晨都會用電話連繫，在話筒中「討論國內外重大事件，交換工作意見等」，通話時間很長。<sup>54</sup>彭真要休息之前，也總會要求其秘書電話詢問、確認周恩來與毛澤東是否已休息，在得知後者歇息後，方肯就寢入眠。<sup>55</sup>

彭真在「文革」中被揭發曾經講過：「自己和總理一樣，晚上辦公，其他人晚上都不辦公。」<sup>56</sup>彭真晚年也表示：

毛主席、周總理深夜工作，劉少奇、鄧小平白天工作，這樣中央工作日夜有接班，不會延誤，我是給毛、劉、周、鄧做助手的，我每天不能睡在他們的前面。<sup>57</sup>

對於彭真精力旺盛、樂於承擔工作，以及對問題鍥而不捨、一抓到底

---

<sup>53</sup>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頁71。

<sup>54</sup> 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在彭真同志身邊工作的歲月〉，《百年潮》，2012年第9期(北京，2012.09)，頁48。

<sup>55</sup> 馬句，〈憶彭真——寫在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之際〉，《前線》，2012年第10期(北京，2012.10)，頁57。

<sup>56</sup> 公安部批判劉、鄧聯絡站，《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在公安戰線上的反革命罪行》(北京，1967)，頁27。

<sup>57</sup> 馬句，〈憶彭真——寫在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之際〉，頁57。

等特質，<sup>58</sup>周恩來是頗為欣賞的。因為對周而言，在國事如麻、國步艱難的情況下，在旁有人能有力地分擔工作，讓黨國正常運作，自是其所樂見。就勤政的角度而言，他可能欣賞積極任事的彭真過於鄧小平。有資料指出，在 1964 年，周恩來曾抱怨：

現在辦事情太困難了。黨的事情只有彭真在管，軍隊全靠羅瑞卿，政府只有我。這麼大的國家，就這麼三個人管具體的事，別的人都只是說說，不做事。<sup>59</sup>

在「文革」前兩、三年，特別是在 1964 年、1965 年，周恩來在處理中央事務時，對彭真有益加倚重的趨勢。這方面的例子不少，例如：1964 年秋，在中共準備進行原子彈試爆的最後階段，在相關機密文件的傳閱對象和秘密會議的參加人選上，周恩來在中央常委和軍方若干元帥外，都將彭真納入。<sup>60</sup>在長期由周恩來主管的外交工作上，也可見周將重要的外交相關文件分送給彭真核閱，<sup>61</sup>並且要後者跟他一起分工，參加對外會談。<sup>62</sup>1964 年底，中共中央在準備、規劃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屆政治協商會議的領導人事問題時，周恩來不但要彭真一同商酌即將換屆新選的國務院副總理名單；<sup>63</sup>更建議讓彭真接任原由周自己身兼的全國政協主席一職。

<sup>58</sup> 彭真的妻子張潔清就表示：「彭真有兩個特點，一是肯動腦子鑽研問題，有不把問題弄清楚就不罷休的精神。二是辦事認真，不管什麼事，到了他那裏，他都認真對待，一抓到底。」張文健，〈學習彭真同志勤奮工作的精神〉，收入本書編輯組，《緬懷彭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356。

<sup>59</sup>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1994），頁422。周恩來在「文革」中就直接批評過鄧小平：「鄧是事情愈少愈好」；〈周總理接見財貿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國家測繪總局二分局計算隊翻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選編》（北京：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1967），頁96。

<sup>6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頁17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675-676。

<sup>61</sup> 例如：1965年7月11日，時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陳毅，將其預定在法國國慶招待會的講話稿報送中共中央審定。周恩來同日閱後批示：「即送主席（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核閱。」〈關於陳毅副總理在法國國慶招待會上講話稿的請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全宗號117，目錄號01770，案卷號01，頁14。

<sup>6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646-647。

<sup>63</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377。

此事因為彭真願以副主席身分代理一切具體工作，而不居主席之銜而作罷。<sup>64</sup>周恩來之所以提議讓彭真接任自己在政協的領導職務，當然首先是因為周觀察到毛澤東對彭真的格外關愛和有心培養。另外，自然也與周恩來同彭真在「一線」內工作關係緊密，兩人在朝夕相處下形成了一定的信任感有關。

想不到的是，政治前景似錦的彭真，不久竟陷入種種的政治風波中，進而被毛澤東批為搞「水滸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成為「文革」的第一批政治「祭品」。在相關事態演變的過程中，周恩來被動地因應。他看待彭真的態度也漸漸地出現轉變。

## 五、彭真在「文革」前政治倒台的原因分析

關於彭真在 1966 年政治倒台的原因問題，中外學界長期以來的流行觀點是因為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而彭真屬於劉的派系要角，毛為了在政治上順利打倒劉，便設計先將彭真剷除，斬斷劉的重要臂膀，使之勢單力孤。<sup>65</sup>然而，這種觀點業已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sup>66</sup>

首先，毛澤東和彭真之間的政治關係，經過緊密而急速的發展，不但不在劉彭關係之下，甚至在中共建國前恐已凌駕在其之上。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開始重用彭真，確有拉攏「白區」幹部的用意，但毛並非簡單地將彭看作是劉少奇所屬的「白區」幹部而起用之，而是視彭

<sup>64</sup> 此乃根據梁漱溟的回憶。梁表示：「在 1964 年尾開的政協會議而於 1965 年初閉幕時，周總理作為政協主席講話，自己抱歉會議全賴各位副主席主持，自己政務繁忙不及照顧，想今後讓彭真接任政協主席。彭真此時就站在他身旁並隨手拍彭右肩說：『但他堅持不肯接，他願以副主席代勞一切而不居名義，那麼，就是這樣吧！』」梁漱溟，〈周恩來總理——如我所知者〉，《文史參考》，第 1 期（北京，2010.01），頁 59。

<sup>65</sup> 針對審查人建議討論的問題：彭真與劉少奇關係是否為彭真被毛澤東打倒的原因？由於本文主題和內容結構的考量，在此僅作簡要的介紹。關於彭劉關係的演變歷程和屬性定位，以及彭何以遭毛罷黜的問題，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深入考察和專門研究。

<sup>66</sup>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真：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真理——黨史專家田西如訪談錄〉，《黨史文匯》，第 11 期（太原，2012.11），頁 22；李海文、王燕玲，〈彭真晚年做的三件事——訪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張文健〉，收入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 371。

為劉之後的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白區」領導人而加以器重。<sup>67</sup>更重要的是，毛自身也有網羅人才、組建政治班底的考量。彭真自 1941 年調赴延安工作時，尚無中央委員身分，卻可破格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並實際主持中央黨校工作，乃出自毛澤東的刻意安排和培植。劉少奇在 1939 年底前往華中工作並到多地指導，他重新回到中共中央時，已是彭真到延安一年多以後的事。彭真在延安擔任的多項黨內要職和工作，亦是在毛的直接領導和過問下。正因毛指揮彭真如臂使指，以及彭真對毛亦步亦趨，毛在 1945 年的中共「七大」選舉中，還特地為彭真拉抬聲勢、爭取票數。<sup>68</sup>在此基礎上，彭真進而得以先後膺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彭真自此「成為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sup>69</sup>

換言之，歷經延安四年的工作關係和政治整合，彭真無疑仍視劉少奇為上級，也不排除他倆因過去淵源所可能形成的特殊連繫和了解，但彭真在行事上更看重的是毛的政治態度並且以之意向為依歸。從這點政治傾向而言，彭真無異於劉和周恩來等其他入。

其次，中共建國以後，在政策共識上，毛彭之間較諸毛劉之間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毛澤東在 1966 年 8 月 5 日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強烈批評劉少奇所犯的兩個嚴重「錯誤傾向」——「1962 年的右傾」和「1964 年的形『左』而實右」。前者指的是：在「大躍進」後的經濟調整時期，劉少奇對情勢過於悲觀的估計，以及他對包產到戶倡議的支持。毛在 1962 年分別斥之為「黑暗風」和「單幹風」。後者指的是：1964 年下半年，劉少奇在主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簡稱為「四清」，其目的是端正不良傾向、防阻幹部和群眾變質)時，抱持基層幹部普遍腐化的看法，以及採取暗地串連、

<sup>67</sup> 1943 年，薄一波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之時，當毛談到「白區」，就先後提及劉少奇、彭真及他們各自的代表性著作，並且大加好評。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 359。

<sup>68</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354, 368.

<sup>69</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 1 卷，頁 317。

開展奪權的作法。

如第三節所述，在「1962年的右傾」問題上，彭真的立場和主張與毛澤東貼近，而與劉少奇有異。在「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問題上，彭真對劉少奇的社教運動的激進主張有所保留；他在首都郊區按之執行時，也發現了暴力蔓延、傷及無辜的現象。1964年底、1965年初，毛澤東在黨內的高層會議上連番批評劉少奇的運動政策，彭真見此也開始向劉反映京郊運動走火的情況。彭真之後專程向毛請示，完全棄置了劉的運動方針。<sup>70</sup>

毛澤東因社教運動問題對劉少奇大發雷霆，甚而心生撤換劉接班人地位的意念。<sup>71</sup>彭真在中央政治中的重要性和活躍度，不但沒有因此受到牽連和影響，反而在1965年達到最高點：一、劉受毛批評後，已不便再繼續主持社教運動，相關的工作改由彭真主持。二、彭真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身分，領導全國文化界、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進工作。<sup>72</sup>另外，彭真該年在中央高層的突出地位，還可見毛單獨找彭真的次數，比找鄧小平還多。<sup>73</sup>周恩來為了與彭真商談工作，有時還親赴彭真的住處移樽就教。<sup>74</sup>然而，彭真在1965年站至中共政治舞台中心的同時，他也逐步陷入各個政治爭論和漩渦，進而一步一步地失去毛的信任。

首先，1965年前半年，彭真主持下的社教運動，一改劉少奇先前在農村大整基層幹部的作法，對原有幹部較為寬待。另外，彭真也著重強調恢復農村秩序和加強農業生產。然而，這一運動方向與毛一再強調的高舉「階級鬥爭」有所出入。在北京市郊參加社教運動的陳伯達(毛的政治秘書)，以及「理論工作者」如關鋒和戚本禹，皆就此向毛告狀，稱彭真麾下的北京市委在「四清」中「右傾」，「搞獨立王國。」另外，1965年春夏之交，彭真也強勢介入社教運動的高校試點——北京大學的「四清」，力保以陸平為首的校黨委領導。一年後，毛公然支持聶元梓批判陸平和北大黨委的大字

<sup>70</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3卷，頁1109-1119。

<sup>71</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383。

<sup>72</sup>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576。

<sup>73</sup>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頁156。

<sup>74</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421。

報。可見毛對彭真在北大「四清」的干預和作法，恐不是全無看法。<sup>75</sup>

第二，毛澤東在 1963 年底、1964 年中對文藝界及其主管部門嚴加批評、要求改進。1964 年 7 月，彭真被毛委任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負責督導相關事務。約此前後，以毛的「文藝哨兵」自居的江青在北京市推行京劇改革，屢屢與彭真和北京市委產生齟齬。江青因此對彭真極為敵視，並且甚有可能向毛非議彭的不是。1965 年 11 月，在江青的組織下(毛知悉此事)，上海《文藝報》刊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嚴厲批判吳晗的相關著作。由於事發突然、不知來由，彭真一時沒有同意北京轉載該文。彭真因吳晗為其北京市的副市長，以及文藝界對姚文來勢洶洶感到不安，他在毛面前努力地為吳晗解釋和澄清，並在 1966 年 2 月上旬積極促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試圖約束正在擴大的文藝批判。正當毛對彭真的信任已甚薄弱的時候，1966 年 3 月上、中旬，彭真又略失躁進地欲動手批整激進文人，更透過人責問上海市委先前發表姚文一事。3 月底，康生據此向毛告狀，毛大為震怒，認定彭真壓制「左派」、袒護壞人。<sup>76</sup>

第三，「文革」前毛澤東在選用可以配合其衝撞黨國官僚的高幹時，長年以來一直對毛表現得忠心耿耿、代表軍方勢力的林彪，益加成為他屬意的主要人選。彭真和林彪之間自國共內戰東北戰場以來，關係長期不睦。再加上，「文革」前夕彭真在處理羅瑞卿(中央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問題時態度消極；他在調查陸定一(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妻子嚴慰冰寫匿名信中傷林彪一家的問題上，也試將陸與其妻切割。<sup>77</sup>由於林彪在此二事中皆作為居於對立面的當事人，益增對彭真的不滿。鑒於彭林關係勢如水火，不易共處、共事，毛在政治上決定進一步地重用林彪時，恐也難以同時任用彭真。<sup>78</sup>

<sup>75</sup>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頁 155-156。

<sup>76</sup>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581；《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4 卷，頁 476。

<sup>77</sup>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 50 年——陸定一傳奇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254-260。

<sup>78</sup>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頁 158。

## 六、「文革」前文藝批判中的周彭互動

眾所周知，在毛澤東同意下，江青得到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協助，對彭真倚重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上綱上線地批判。圍繞此事，各方領導人的表態、互動、折衝，以至衝撞，基本釀就、導致了「文革」爆發的政治態勢。<sup>79</sup>在此過程中，尤其是毛澤東從幕後走至幕前，其政治喜惡形諸檯面以前，周恩來與彭真對局勢所作的解讀和反應方式，有很大的相似性，並在若干時間點上表現得一致。

例如：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公諸於世後，1965年11月底，經周恩來、彭真共同修改審定的《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多處強調「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指出：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

亦即，周、彭兩人希冀將相關問題定位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而不使之往政治批判的方向發展。之後隨著相關問題愈加升級，領銜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彭真，在1966年2月上旬，進一步主導制定了經過周恩來在內的首都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其中實際吸納、肯定了彭真主張的意見：吳晗問題的性質是學術而非政治，吳晗和彭德懷沒有任何聯繫(實質否定了說吳寫海瑞意在為彭叫屈、翻案的指控)，以及在學術問題上要堅持「雙百方針」等。<sup>80</sup>

如前所述，可以注意到彭真對吳晗著作爭論一事的所持立場和處置辦法，周恩來皆表同意。約此之後，周恩來也數次表現出對彭真的欣賞和信任，而明顯地與心思愈趨深重難測的毛澤東看法有別。2月8日，當彭真南下武漢跟毛面報《匯報提綱》的同時，周恩來在外交部第四次駐外使節

<sup>79</sup>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 17-19.

<sup>80</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3卷，頁1201-1207。

會議上，還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樹立一個新的外交風格」的建議。<sup>81</sup>3月12日，周恩來在即將離開首都前赴河北停留、調查一個月前，致信劉少奇、彭真等人，其中提出：在劉少奇、陳毅等出國訪問期間，可將中央掌管的外交、國防工作交彭真負責。周並表示：「需要我回京時，請彭真同志給我打電話，隨告隨到。」如此顯示周恩來截至斯時仍將彭真視作可代行主持中央重要工作的領導人，並樂於與之配合。毛澤東對彭真的信任，在這段期間內正在快速地流失中。如第五節所言，其原因包括：毛自身看法愈漸偏激的變化、康生和江青從中的挑撥生事，以及彭真方面對情勢的輕判與對應策略的略失躁進。

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大批中宣部與《人民日報》，不滿的火氣也開始直接向彭真顯露和發作。毛以上海滬劇《蘆蕩火種》不能在彭真轄下的北京市演出為由，當面批評彭真是搞「獨立王國」。毛澤東為顯示自己的感受不是個別獨有的，他人對相關指控也有所同感，毛問同在現場的周恩來：「你的感覺怎麼樣？」周恩來的反應或教毛有些意外。因為周沒有順毛之意附和而是回覆：「我還沒有什麼感覺。」<sup>82</sup>關於周恩來的相關表態，有論者指出是：毛澤東得不到周恩來「積極的響應」，以及後者「讓毛澤東碰了一個軟釘子。」<sup>83</sup>事後，周恩來在聽了彭真所作的相關說明後，還有些責怪彭真沒有當場對毛適時作出必要的解釋和澄清。<sup>84</sup>

3月杭州會議後，周恩來仍沒有改變看重彭真的態度。3月24日，周恩來對來訪的北越領導人表示：

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到農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現在不多，所以，我跟彭真同志訂了個協定，一旦有

<sup>81</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頁1835。

<sup>8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頁1837。

<sup>83</sup>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05-106。

<sup>84</sup> 根據彭真秘書項淳一的說法：彭真後來曾向周恩來解釋《蘆蕩火種》演出一事風波的由來，並指出其原來即已委託副市長萬里安排該劇在首都演出的場次。周恩來聞後問道：「那會上你怎麼不說話呢？」彭真回答：「我不好當面頂撞主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頁1837。

重要的事情，他打電話要我回來，我馬上回來。

在旁的彭真表示：「總理在家，我們比較享福一點。」<sup>85</sup>彭真此時或許還懷有一種幸得周恩來政治關照的感嘆。然而，沒幾天的光景，情勢急轉直下，更到了無法挽回的田地。

康生在3月底帶來毛澤東的口諭，威脅說彭真若再包庇壞人，就要解散彭領頭的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另外，毛也話中有話，向周恩來示警，要之不要再試圖從中調和。<sup>86</sup>先前一再想息事寧人、如常對待彭真的周恩來，至此已難以再迴避毛澤東欲批整彭真的要求了。4月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呈送報告表示：

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這些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這是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同時，指出前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是錯誤的，擬由書記處召開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邀集上海、北京有關同志加以討論，或者進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寫。<sup>87</sup>

周恩來此時或仍認為彭真縱使有錯，應也不至於影響其繼續作為中央「一線」領導人的地位。因為在同一信中，周恩來表示他將去河北視察，「擬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當由彭真同志告我趕回。」<sup>88</sup>

在周恩來上呈報告的同日，彭真也匆匆地向毛澤東提交一個簡短的報告，檢討其思想跟不上，《二月提綱》有嚴重缺點和錯誤。<sup>89</sup>但是對彭真的

<sup>8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頁1835。

<sup>86</sup> 毛澤東和康生的講話中，嚴斥彭真包庇資產階級學閥和反共知識分子的同時，也提到周恩來。毛表示：「周同這些人，不能不接近，但是要注意。」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07。

<sup>87</sup> 文中所提「送主席審閱的五人小組報告」，指的是彭真主持、經過周恩來等在京中央常委同意的《二月提綱》。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07-108。周恩來的相關表態，不見於中共官方的周恩來傳記和年譜。

<sup>8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頁1837-1838。

<sup>89</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47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08。

政治批判愈演愈烈，進而發展成其一敗塗地的慘況。4月9日、11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參與其中)、<sup>90</sup>4月16日至24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彭真皆成為眾矢之的。4月28日，毛澤東進而表示：

北京市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觀來改造黨，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對他錯誤要徹底攻。<sup>91</sup>

彭真根本無法翻轉政治被動的局面，周恩來即便對之還心有同情，也愛莫能助，他一切依毛澤東的態度決定自己的行止。5月4日至26日，北京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會作為「文革」全面發動的標誌性會議)，彭真與先前已被打倒或靠邊站的中央書記處同仁，更被打成「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

值得一提的是，在4月杭州會議期間，彭真在檢討《二月提綱》的「錯誤」時，周恩來、劉少奇沒有迴避自身對《二月提綱》曾予以背書的事實，強調他們也負有責任。彭真聞後強調：「這個提綱錯了，應由我個人承擔責任，與少奇同志、總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無關，他們沒有也不應當承擔責任。」<sup>92</sup>這既反映出幾位「一線」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和彭真之間，在情勢無法扭轉下仍盡可能地維持對對方的尊重。

根據周恩來的官方傳記的記載，4月杭州會議期間，周恩來曾找彭真談話三次。至於兩人談話的內容，則沒有進一步的披露。<sup>93</sup>根據彭真秘書的回憶，彭真晚年曾表示：「1966年4月底，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周總理對我說：『黨不能分裂，你有意見，可以保留。』」<sup>94</sup>周恩來如此勸告、

<sup>90</sup> 根據高文謙提供的訊息，周恩來在相關的書記處會議上，與鄧小平一起指出：彭真所執行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108。

<sup>91</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第5卷，頁581。

<sup>92</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3卷，頁1224；《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483。

<sup>9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頁1839。

<sup>94</sup> 馬向，〈憶彭真——寫在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之際〉，頁59。

囑咐彭真，可見其認為彭真未必真的犯有什麼原則性或立場性的致命錯誤，因此後者如內心不服、持有異議，可以有所保留。但由於毛澤東欲拔除彭真的心意清楚展現，已無法更動。彭真從此前政治上的發紅、發紫，甚至有更上一層樓的前景，突然墜入無底深淵，一定感到委屈難受(彭真當時就自言「腦子很亂」)，想要當面將問題攤開。彭真在此次會議期間就曾提出想找毛直陳己見，甚至趁毛散步時求見。以周恩來對彭真性急、直率性格的了解，彭真在情急之下，若大吵大鬧起來，將會讓毛澤東難堪、損及其領導威信，也使得整個領導層的氛圍更為緊繃、對立。因此，周恩來向彭真訴諸於「黨性」的要求，要之暫拋個人的政治生死於度外，就當作是相忍為黨。事實上，周恩來以「積極地保持晚節」作自我要求，應對隨後來而來的「文革」風暴，就是基於類似的心理。<sup>95</sup>

## 七、「文革」中周恩來對彭真問題的處理

### (一) 周對彭的政治切割和人身保護

在彭真政治倒台已是定局後，周恩來公開表示：「彭真是毛主席親自揪出來的」；<sup>96</sup>「彭(真)也是林總(林彪)發現的最早。」<sup>97</sup>周恩來對彭案若公然地反對，不但有違逆上意，進而引火上身的危險，也有不尊重「運動積極分子」的「鬥爭果實」的風險。為了表示自身的認識與黨中央的立場無異，周恩來在包括中央高層會議在內的多次公開場合裏，也對彭真的錯誤進行批判和揭發。周恩來徹底地與彭真做政治切割，是符合當時中共黨內殘酷的政治生存法則和運作邏輯。事實上，江青曾欲從周恩來的重要助手下手，意圖作周恩來和彭真之間關係的文章，以讓周在相關的政治泥沼中

<sup>95</sup> 周秉德，鐵竹偉執筆，《我的伯父周恩來》(香港：滿威利基金會，2007)，頁290。

<sup>96</sup> 〈周恩來接見陸海空三軍參加地方四清運動的部分同志的講話(1967年1月21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sup>97</sup>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滅頂。<sup>98</sup>

在「文革」中，周恩來盡其所能地對遭到運動衝擊的政治、社會菁英伸以援手，因而常被中國大陸的相關出版物喻為是「大樹參天護英華。」他對於彭真所受的政治磨難，也曾適時予以關心和照顧。彭真在政治上「中箭落馬」、遭到撤職後，周恩來細心地交代北京衛戍區繼續派任警衛部隊至彭真住處進行保護。<sup>99</sup>1966年12月4日零時，彭真被「紅衛兵」突襲綁架擄走，周恩來在接到彭妻張潔清的求助電話後，<sup>100</sup>一方面要求北京衛戍區迅速尋找彭真的下落；另一方面，也親自出面和涉案的「革命小將」周旋、談判，並機智地利用他們和中央「造反派」戚本禹之間的聯繫，要戚出面，促之放人轉交衛戍區監護，終而化解彭真這場人身安全的危機，<sup>101</sup>使彭沒有步上一些「走資派」喪命在「造反派」手上的悲慘命運。周恩來的此次相救，讓身為政治「死老虎」的彭真心生不少的信心，認為自己總有撥雲散霧見青天的一日。彭真晚年回憶此事說：

1966年我被紅衛兵劫走，藏了起來，周總理知道後，立即叫人在三天之內把我找出來，找到後，又叫人看守我。我心裡就更有底了，相信黨中央一定會弄清我的問題給我平反。我在秦城監獄裡，非常注意保護身體，我想一定要挺住，活到給我平反的那一天。<sup>102</sup>

躲過了綁架冤死的劫數，彭真仍難逃批鬥大會的活罪。為了控制鬥爭會場的局勢，周恩來主動提出要參加；為了預防與會群眾「革命義憤」難抑而對彭真動粗，周恩來交代北京衛戍區的負責人要備妥緊急後撤方案。<sup>103</sup>

<sup>98</sup> 根據童小鹏回憶：「江青一伙羅織許明的『罪證』，說許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來身邊的『釘子』，實際上是想把彭真與周恩來連繫起來，因為彭真當時是中央點名的反黨集團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險惡。」童小鹏，《在周恩來身邊的四十年》下冊，頁658。

<sup>99</sup>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23-24。

<sup>100</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492。

<sup>101</sup> 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187-188。

<sup>102</sup> 馬甸，《憶彭真——寫在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之際》，頁59。

<sup>103</sup> 根據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的回憶：「造反派要批鬥彭真同志前，周總理找我說：『我也參加批鬥會。』周總理具體向我交代如何作好保護措施。周總理讓我們準備好車輛，並準備一架直升飛機。批鬥大會在東郊體育場開，直升機就放在

對於彭真的政治崩盤和後續的遭難，周恩來無力扭轉，也不想為此招惹麻煩，力求與中央保持一致。但周還是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減少彭真在身體上遭受的責罰，進而保存後者的生命。這反映周政治心思細膩和手腕圓通之處。<sup>104</sup>

彭真最後被關進了他當初參與建造的秦城監獄，張潔清也遭到同樣的待遇。兩人失去所有的對外連繫長達數年之久。彭真的子女出於思念之情，希望在飽經顛沛流離之苦後，能見得父母一面。他們在求助鄧穎超之後，總算在 1972 年以探監的形式，先後見到母親張潔清和父親彭真。這無疑出自周恩來在幕後的安排。在肅殺的政治中偶爾流露出一些人情味，是周恩來的一項政治風格。

## (二)關於周對彭政治態度的考察

周恩來在「文革」中、後期，常為人稱道的是他能審時度勢、進而順水推舟，讓一些苦蹲「牛棚」、飽受「勞動改造」之災的老幹部重返政治舞臺，發揮政治作用和餘熱。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協助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排除種種形式的困難東山再起。彭真在 1966 年政治出局後，如同鄧小平一樣，並非完全從毛澤東心中消失。根據王力的回憶，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提到彭真時，還會略帶惋惜地指出：彭真和鄧小平、陶鑄的問題是「性子都太急。」<sup>105</sup>1967 年 7 月 18 日，毛澤東在武漢和周恩來等人談話時表示：「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毛並列舉了鄧小平、彭真、賀龍等人的名字。<sup>106</sup>作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之首的彭真，

---

東郊體育場適當的地方偽裝起來。幾萬人大會批鬥，萬一出現不可預料的情況，就強行把彭真同志架出體育場，用準備好的車輛拉走。萬一車被攔，就把他送上直升飛機，開到安全地區。周總理這些交代，我們都堅決落實了。」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頁 189。

<sup>104</sup>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84-185。

<sup>105</sup>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668。

<sup>10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下冊，頁 1938。

不像劉少奇，始終沒有被開除黨籍。<sup>107</sup>毛澤東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就有資料指稱，毛曾針對彭真問題表示：「至少要保留黨籍，分配工作。」<sup>108</sup>

1971年秋，林彪北走墜機身亡後，毛澤東重新回頭眷顧那些過去跟林彪存在政治競爭和緊張關係的政治人物，起用鄧小平就是一例。在國共內戰東北問題上與林彪意見不合、而與之長期心存芥蒂的彭真，毛澤東或也曾經有所考慮。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共中央軍委會會議的成員。當毛談到1960年6月中蘇共兩黨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交鋒一事時，問到鄧小平：「那次你去了吧？」鄧回覆：「沒有。那次我沒去，彭真、康老去了。」毛澤東聞後表示：「彭真對於整『蘇修』還是有功的。」並問：「現在他怎樣？」<sup>109</sup>在此一場合，周恩來也出席在座。<sup>110</sup>

在「解放」老幹部的問題上，向來懂得見機而作、擅於化繁為簡，甚至在必要時會與「文革當權派」據理力爭的周恩來，有否在彭真「解放」的問題上出手相挺？針對毛澤東對彭真近況的詢問，周恩來當場的回應僅是表示：「他還有個歷史問題要查清。」<sup>111</sup>周恩來為何態度不甚積極、熱絡？其作何權衡考量？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毛澤東雖然問及彭真的情況，但主要是在試探，沒有表達更明確的態度（針對鄧小平的問題，毛就曾親筆批示並批轉黨內傳閱）。周恩來對此問題小心翼翼，是比較保險的作法。

二、鄧小平剛剛復出視事，還沒有真正開始施展拳腳，周恩來或認為彭真復出一事可以暫緩，之後再說。

三、對於權力現狀可能產生的波動影響，應也是周恩來考慮的問題。關於鄧小平重回政治舞台一事，在毛澤東開了金口後，周恩來也是頗費一番唇舌下，才在上層菁英中形成共識。彭真倒台，康生、江青涉入極深，

<sup>107</sup>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真：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真理——黨史專家田西如訪談錄〉，頁22。

<sup>108</sup>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44。

<sup>109</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3卷，頁1267；《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508。

<sup>11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638。

<sup>111</sup>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頁157。

他們也視成功倒彭是自己的主要事功。貿然主張彭真復出，必然首先遭遇此二人的質疑和反對，吃力不討好。

四、彭真是一位慣行大權、要幹實事的政治人物，周恩來在「文革」前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的往來過程中，對此甚為熟知和了解。如何在中央安置事業心和權力欲皆很強的彭真，也將是一個大費周章的問題。

五、彭真倒台後，針對他的政治揭發大量湧現，其中既有暴露彭真過去較為隱藏的政治行徑的材料，<sup>112</sup>也有反映彭真對周恩來不敬的資料。<sup>113</sup>如此可能也多少負面影響了周恩來對彭真的個人觀感和評價。

從目前可得的資料中看來，毛澤東後來沒有再提起彭真的問題。可能是因為他覺得當時身邊包含周恩來在內的政治要人，對此都興趣缺缺。針對彭真歷史的專案調查，在 1975 年做出彭真在歷史上當過叛徒的結論。毛澤東閱後沒有批可。<sup>114</sup>彭真的政治問題繼續僵持下去。遲至 1978 年底，在華國鋒等人的支持下，彭真才回到北京。<sup>115</sup>此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早已離世超過兩年。

## 八、結論

從前述正文對周恩來和彭真關係發展的爬梳和研究，可以進一步地探討影響周彭關係發展的主要原因，以及本文的探討如何增進對中共早期政

<sup>112</sup> 例如：高崗的遺孀在「文革」中面告周恩來，1959年廬山會議後和1962年小說《劉志丹》事件(該小說被指控意在為高崗翻案，習仲勳因此事被株連)爆發後，她遭到彭真等人限制行動和約談。周恩來聞後表示：「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對他們有了進一步了解。」李力群，〈難忘的回憶〉，「給高崗平反」網站：[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43e4ed0100qghk.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43e4ed0100qghk.html) (2013/02/01點閱)。

<sup>113</sup> 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批評彭真時，即有人插話揭發：「彭真說總理總講他的社會出身，黨內講，黨外也講，真有點麻煩，講得太頻繁了。」〈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sup>114</sup> 1975年5月21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對彭真問題做出的結論，是將彭真定為「叛徒、反黨分子。」但此一政治結論呈報中共中央後，「中央沒有審批。」〈中共中央關於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1979年2月17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sup>115</sup>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4卷，頁519-520。

治的了解。

首先，周恩來和彭真進行政治互動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以毛澤東為運轉核心的政治環境，尤其是毛澤東個人的政治態度和好惡。<sup>116</sup>至於周彭彼此直接相處往來的效果，則居於次要，甚至直接受限於前者。在周恩來方面，周知曉毛澤東對彭真的欣賞和重用，所以即使他對彭真早先的作為(延安整風)有些不快，也長年隱忍不發。周在黨內地位比彭真要高，也不敢對之倚老賣老；周見毛對彭有意栽培，也配合對之加以提攜。在彭真方面，彭了解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那種不全滿意但又有所依賴的複雜心理，因此對周維持一定的尊敬，不敢過於造次，並且在工作上勤快努力，以減輕周的負擔。正當周、彭之間工作搭配融洽、關係穩健發展，毛在「文革」前夜決定在政治上清除彭真，周縱使與彭政治觀點(針對文藝批判)相似，也苦心勸說後者不要抵抗、甘願就範。在「文革」期間，周在彭真的出路問題上消極以對、思慮多重，也是因為毛對此一問題沒有下定決心。

從對周彭關係的研究中，可以更豐富我們對「文革」前中共中央在進行二線分工時，在「一線」內的政治運作情形的認識。過去學界對於彭真在「一線」內擔任要角的情況，沒有太多的注意，甚至只簡單地將之看作劉少奇的政治班底和執行幫手。然而，自前文對「文革」前周彭關係的描述，可顯現彭真在「一線」內不但據有一席之地，還與毛澤東立場相近，在不短的時間內獲之榮寵。周恩來在 1958 年後尊重彭真在中央書記處位居副座的職權，有時還不惜紆尊降貴。彭真在 1962 年經濟調整的政策主張上，提出有別於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的觀點，也可見彭真在「一線」內的政治自主性，以及其自身同樣致力於向毛看齊。這有效顛覆了「一線」領導人因要共負政策得失而猶如「鐵板一塊」的印象，以及彭真在政治上從屬於劉少奇的刻板分類。

此後，在「文革」前的兩至三年，周恩來和彭真是「一線」內負責最多事務、彼此也共事最密切的兩位中央領導人；他們甚至一度合力扛下「一

---

<sup>116</sup>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6-8.

線」的主要工作。周恩來見彭真有向上發展的政治潛能，還曾主動建議讓出自己的部分職銜(政協主席)並提議委之以重任(暫時代管中央負責的外交和國防工作)。這段時間周恩來對彭真的重視程度，頗能反映、體現後者在「文革」前「一線」內要而不顯的政治地位。此一事實因為突如其來的「文革」和政治清洗，而長期被掩蓋和忽視。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檔案史料

- 〈千刀萬剮心不甘——憤怒揭發楊尚昆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  
《戰報》(北京)，1967年2月15日，4版。
- “Qian dao wan gua xin bu gan: fen nu jie fa Yang Shangkun de fan dang fan she  
hui zhu yi fan Mao Zedong si xiang de zui xing,” *Zhan bao* (Beijing), 1967.02.15,  
4 ban.
- 〈中共中央關於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1979年2月17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  
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電子資  
源。
- “Zhong gong zhong yang guan yu wei Peng Zhen tong zhi ping fan de tong zhi  
(1979.02.17),” shou ru, Song Yongyi, deng bian, *Zhong guo wen hua da ge ming  
wen ku*, Hong Kong: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zhong guo yan jiu fu wu zhong  
xin, 2002, dian zi zi yuan.
- 〈反革命兩面派陶鑄罪惡史〉，《東方紅戰報》(江蘇)，1967年9月15日，8版。
- “Fan ge ming liang mian pai Tao Zhu zui e shi,” *Dong fang hong zhan bao*  
(Jiangsu), 1967.09.15, 8 ban.
- 〈吳晗為藝術處理問題給總理、彭真、萬里同志的函〉，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  
002，目錄號011，案卷號00140。
- “Wu Han wei yi shu chu li wen ti gei zong li, Peng Zhen, Wan Li tong zhi de han,”  
Beijing shi dang an guan cang, quan zong hao 002, mu lu hao 011, an juan hao  
00140.
-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21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  
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電子資  
源。
- “Zhou Enlai zai zhong yang zheng zhi ju kuo da hui yi shang de jiang hua  
(1966.05.21),” shou ru, Song Yongyi, deng bian, *Zhong guo wen hua da ge ming  
wen ku*, Hong Kong: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zhong guo yan jiu fu wu zhong  
xin, 2002, dian zi zi yuan.

〈周恩來接見陸海空三軍參加地方四清運動的部分同志的講話(1967年1月21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電子資源。

“Zhou Enlai jie jian lu hai kong san jun can jia di fang si qing yun dong de bu fen tong zhi de jiang hua (1967.01.21),” shou ru, Song Yongyi, deng bian, *Zhong guo wen hua da ge ming wen ku*, Hong Kong: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zhong guo yan jiu fu wu zhong xin, 2002, dian zi zi yuan.

〈周恩來同志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負責人座談會的談話紀錄〉，廣東省檔案館藏，全宗號216，目錄號1，案卷號116。

“Zhou Enlai tong zhi zai ge min zhu dang pai, wu dang pai min zhu ren shi fu ze ren zuo tan hui de tan hua ji lu,” Guangdong sheng dang an guan cang, quan zong hao 216, mu lu hao 1, an juan hao 116.

〈蔣南翔同志傳達四中全會報告〉，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001，目錄號022，案卷號00089。

“Jiang Nanxiang tong zhi chuan da si zhong quan hui bao gao,” Beijing shi dang an guan cang, quan zong hao 001, mu lu hao 022, an juan hao 00089.

〈關於陳毅副總理在法國國慶招待會上講話稿的請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藏，全宗號117，目錄號01770，案卷號01。

“Guan yu Chen Yi fu zong li zai fa guo guo qing zhao dai hui shang jiang hua gao de qing shi,”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wai jiao bu dang an guan cang, quan zong hao 117, mu lu hao 01770, an juan hao 01.

公安部批判劉、鄧聯絡站，《徹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在公安戰線上的反革命罪行》，北京，1967。

Gong an bu pi pan Liu, Deng lian luo zhan. *Che di qing suan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fen zi Peng Zhen zai gong an zhan xian shang de fan ge ming zui xing*, Beijing, 1967.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電子資源。

Mao, Zedong. “Zai zhong yang gong zuo hui yi shang de jiang hua (1966.10.25),” shou ru, Song Yongyi, deng bian, *Zhong guo wen hua da ge ming wen ku*, Hong Kong: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zhong guo yan jiu fu wu zhong xin, 2002, dian zi zi yuan.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電子資源。

Mao, Zedong. "Pao da si ling bu: wo de yi zhang da zi bao," shou ru, Song Yongyi, deng bian, *Zhong guo wen hua da ge ming wen ku*, Hong Kong :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zhong guo yan jiu fu wu zhong xin, 2002, dian zi zi yuan.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國家測繪總局二分局計算隊翻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選編》，北京：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1967。

Beijing di zhi xue yuan dong fang hong gong she, Guo jia ce hui zong ju er fen ju ji suan dui fan yin. *Wu chan jie ji wen hua da ge ming yun dong zhong shou zhang jiang hua xuan bian*, Beijing: Beijing di zhi xue yuan dong fang hong gong she, 1967.

首都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關於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材料》第4集，北京：首都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1966。

Shou dou dou zheng Peng, Luo, Lu, Yang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ji tuan xi jiao chou bei chu. *Guan yu Peng, Luo Lu, Yang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ji tuan cai liao*, di 4 ji, Beijing: Shou dou dou zheng Peng, Luo, Lu, Yang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ji tuan xi jiao chou bei chu, 1966.

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機關摧舊兵團，《彭真罪行錄：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頭目罪行錄1》，北京：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機關摧舊兵團，1967。

Yuan Beijing shi wei, Shi ren wei ji guan cui jiu bing tuan. *Peng Zhen zui xing lu: Peng Zhen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ji tuan tou mu zui xing lu 1*, Beijing: Yuan Beijing shi wei, Shi ren wei ji guan cui jiu bing tuan, 1967.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戰鬥兵團，《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二號頭目劉仁罪惡史(1927-1966)》，北京，1967。

Yuan Beijing shi wei ji guan Mao Zedong si xiang hong qi zhan dou bing tuan. *Peng Zhen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ji tuan er hao tou mu Liu Ren zui e shi (1927-1966)*, Beijing: Yuan Beijing shi wei ji guan mao ze dong si xiang hong qi zhan dou bing tuan, 1967.

## (二) 回憶史料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Wang, Li. *Wang Li fan si lu*, xia ce, Hong Kong: Bei xing chu ban she, 2001.

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Wang, Guangmei, Liu Yuan, deng zhu, Guo Jiakuan, bian. *Li shi ying you ren min*

- shu xie: ni suo bu zhi dao de Liu Shaoqi*, Hong Kong: Tian di tu shu you xian gong si, 1999.
-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10期(北京，2012.10)，頁68-73。
- Wang, Hanbin, kou shu, Han Qinying, fang wen. “Zai Peng Zhen shen bian gong zuo er shi wu nian de pian duan hui yi,” *Zhong gong dang shi yan jiu*, di 10 qi (Beijing, 2012.10), 68-73.
- 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憶周總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 Wu, Qingtong. *Zhou Enlai zai “wen hua da ge ming” zhong: hui yi Zhou zong li tong Lin Biao, Jiang Qing fan ge ming ji tuan de dou zheng, zeng ding ben*,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2002.
- 李力群，〈難忘的回憶〉，「給高崗平反」網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43e4ed0100qghk.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43e4ed0100qghk.html) (2013/02/01點閱)。
- Li, Liqun. “Nan wang de hui yi,” “Gei Gaogang ping fan” wang zhan: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43e4ed0100qghk.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43e4ed0100qghk.html) (2013/02/01 dian yue).
-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1994。
- Li, Zhisui. *Mao Zedong si ren yi sheng hui yi lu*, Taipei: Shi bao wen hua, 1994.
- 李海文、王燕玲，〈秘書張道一談彭真和毛澤東1963年後的關係〉，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 (2011/05/01點閱)。
- Li, Haiwen, Wang Yanling. “Mi shu Zhang Daoyi tan Peng Zhen he Mao Zedong 1963 nian hou de guan xi,” Ren min wang: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 (2013/02/01 dian yue).
-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
- Li, Haiwen, Wang Yanling, bian zhu, *Shi ji dui hua: yi xin zhong guo fa zhi dian ji ren Peng Zhen*, Beijing: Qun zhong chu ban she, 2002.
-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Li, Xuefeng. “Wo zai Xiaoping tong zhi ling dao xia gong zuo de er shi si nian,” shou ru,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Hui yi Deng Xiaoping, shang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 周秉德，鐵竹偉執筆，《我的伯父周恩來》，香港：滿威利基金會，2007。

- Zhou, Bingde, Tie Zhuwei, zhi bi. *Wo de bo fu Zhou Enlai*, Hong Kong: Man wei li ji jin hui, 2007.
- 岳祥口述，熊根琪、楊洋整理，〈在彭真同志身邊工作的歲月〉，《百年潮》，2012年第9期(北京，2012.09)，頁46-52。
- Yue, Xiang, kou shu, Xiong Genqi, Yang Yang, zheng li. “Zai Peng Zhen tong zhi shen bian gong zuo de sui yue,” *Bai nian chao*, di 9 qi (Beijing, 2012.09), 46-52.
- 馬句，〈彭真和北京城市建設〉，收入李海文主編，《彭真市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 Ma, Ju. “Peng Zhen he Beijing cheng shi jian she,” shou ru, Li Haiwen, zhu bian, *Peng Zhen shi zhang*, Taiyuan: Shanxi ren min chu ban she, 2003.
- 馬句，〈憶彭真——寫在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之際〉，《前線》，2012年第10期(北京，2012.10)，頁57-59。
- Ma, Ju. “Yi Peng Zhen: xie zai ji nian Peng Zhen dan chen 100 zhou nian zhi ji,” *Qian xian*, di 10 qi (Beijing, 2012.10), 57-59.
- 張文健，〈學習彭真同志勤奮工作的精神〉，收入本書編輯組，《緬懷彭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Zhang, Wenjian. “Xue xi Peng Zhen tong zhi qin fen gong zuo de jing shen,” shou ru, Ben shu bian ji zu, *Mian huai Peng Zhe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 梁漱溟，〈周恩來總理——如我所知者〉，《文史參考》，第1期(北京，2010.01)，頁58-59。
- Liang, Shuming. “Zhou Enlai zong li: ru wo suo zhi zhe,” *Wen shi can kao*, di 1 qi (Beijing, 2010.01), 58-59.
- 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 Fu, Chongbi. *Fu Chongbi hui yi lu*,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1999.
- 童小鵬，《在周恩來身邊的四十年》下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 Tong, Xiaopeng. *Zai Zhou Enlai shen bian de si shi nian*, xia ce, Beijing: Hua wen chu ban she, 2005.
-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 Huang, Zheng, zhi bi. *Wang Guangmei fang tan l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6.
-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戰爭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Bo, Yipo. *Qi shi nian fen dou yu si kao (shang juan): zhan zheng sui yue*,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1996.

### (三)年譜、文集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匯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7冊，北京，2002。

“Zhong hua ren min gong he guo shi gao” bian wei hui, hui bian. *Deng Liqun guo shi jiang tan lu*, di 7 ce, Beijing, 2002.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3、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Peng Zhen zhuan” bian xie zu, bian. *Peng Zhen nian pu*, di 3, 4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Mao Zedong nian pu (1949-1976)*, di 5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Zhou Enlai nian pu (1949-1976)*, zhong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Deng Xiaoping nian pu (1904-1974)*,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9.

### (四)研究專書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Peng Zhen zhuan” bian xie zu, Tian Youru. *Peng Zhen zhu chi dong bei ju*,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7.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Peng Zhen zhuan” bian xie zu, Tian Youru. *Peng Zhen zhuan lu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7.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1、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Peng Zhen zhuan” bian xie zu, bian. *Peng Zhen zhuan*, di 1, 3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Mao Zedong zhuan (1949-1976)*,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Zhou Enlai zhuan*,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
- Gao, Wenqian. *Wan nian Zhou Enlai*, New York: Ming jing chu ban she, 2003.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 Zhang, Suhua. *Bian ju: qi qian ren da hui shi mo*, Beijing: Zhong guo qing nian chu ban she, 2006.  
陳清泉，《在中共高層50年——陸定一傳奇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Chen, Qingquan. *Zai zhong gong gao ceng 50 nian: Lu Dingyi chuan qi ren sheng*,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6.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Chen, Yaohuang. *Tong he yu fen hua: Hebei di qu de gong chan ge ming, 1921-1949*,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2012.  
趙家樑、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 Zhao, Jialiang, Zhang Xiaoji. *Ban jie mu bei xia de wang shi: Gao Gang zai Beijing*, Hong Kong: Da feng chu ban she, 2008.  
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 Chung, Yen-Lin. *Wen ge qian de Deng Xiaoping: Mao Zedong de "fu shuai" (1956-1966)*, Hong Kong: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2013.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 (五) 期刊論文

- 李向前撰稿、王桂華編導，〈彭真〉，《百年潮》，2002年第11期(北京，2002.11)，頁75-80。
- Li, Xiangqian, zhuan gao, Wang Guihua, bian dao. "Peng Zhen," *Bai nian chao*, di

11 qi (Beijing, 2002.11), 75-80.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真：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真理——黨史專家田西如訪談錄〉，《黨史文匯》，第11期(太原，2012.11)，頁15-22。

Meng, Hong, Ren Yuan, Wang Yanping. "Peng Zhen: yi sheng shi shi qiu shi yu jian chi zhen li: dang shi zhuan jia Tian Youru fang tan lu, *Dang shi wen hui*, di 11 qi (Taiyuan, 2012.11), 15-22.

郝建國，〈彭真餐廳講「大事」〉，《百年潮》，2011年第4期(北京，2011.04)，頁25-29。

Hao, Jianguo. "Peng Zhen can ting jiang 'da shi,'" *Bai nian chao*, di 4 qi (Beijing, 2011.04), 25-29.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第51期(香港，2013.04)，頁136-159。

Liu, Zheng, Zhang Chunsheng. "Cong li shi de ji ge zhong da guan jie kan Peng Zhen he Mao Zedong de guan xi," *Ling dao zhe*, zong di 51 qi (Hong Kong, 2013.04), 136-159.

鍾延麟，〈中共建政後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49-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臺北，2009.11)，頁169-220。

Chung, Yen-Lin. "Zhong gong jian zheng hou Zhou Enlai yu Deng Xiaoping guan xi zhi yan jiu (1949-1976),"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li shi xue bao*, di 32 qi (Taipei, 2009.11), 169-220.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339-387.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Enlai and Peng Zhen (1928-1976)**

Chung, Yen-Li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Zhou Enlai and Peng Zhen were both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ou and Peng did not have very pleasant political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mid-1940s, Zhou was harshly criticized. Peng w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campaigners, and deeply involved in the struggle meetings targeted at Zhou.

In spite of this negative experience in intera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and Peng developed smoothly from 1949 to the eve of the erup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which, Zhou mainly acted as premier of the government while Peng mainly served as the No. 2 leader of the Party Central Secretariat in charge of the Party's daily works on behalf of the Party Center from 1956. The first reason that Zhou valued Peng is that the latter was in Mao Zedong's good graces, and was entrusted by him to play a very crucial political role in elite politics and to handle the daily affairs of the Party Center. Secondly, in sharp contrast to Zhou and other Party leaders within the so-called First Front leadership, in early 1960s, Peng and Mao had shared considerable consensus over the issues regarding the policie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after the disastrous Great Leap Forward. To Zhou, Peng's related political performance was very impressive. Thirdly, Zhou appreciated that Peng devoted himself to doing his best to support Zhou to run the Party-state. They not only cooperated well but also created much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 during the above political operations and interactions.

On no account can the reality be ignored that Mao was the most crucial factor aff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and Peng. When Peng gradually lost his graces from Mao, and the Supreme Leader expressed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Peng much more explicitly, Zhou had no choice but give up his political support toward Peng during the unfol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though Zhou once tried to ease Peng's sufferings after his political purge, he did not seem to be active in his support of Peng to return to the political stage during the turbulent campaign.

**Keywords: Zhou Enlai, Peng Zhen, Mao Zedong, Chinese Elite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